

新时代佛教中国化背景下寺院管理的创新路径研究

圣朗 法禅 常智 能诚 庆缘

(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江苏苏州,215000)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乃是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实践维度。寺院管理作为佛教自我治理之核心环节,其创新路径究竟如何展开,直接关系到佛教中国化能否真正落地生根。本文以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佛教寺院管理创新的实践为考察对象,梳理其现状,分析理念滞后、人才短缺、创新实践落地难等共性困境及各语系所面临的个性困境,进而从理念、制度、服务三个维度提出寺院管理创新的可行路径,以期为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提供些许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新时代佛教中国化;寺院管理;三大语系;创新路径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2i3.1438>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迄今已逾两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不断与中华文化相融相化,从最初的“方外之宾”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佛教如何继续沿着中国化的方向健康传承,如何在当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已成为佛教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202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支持引导宗教界在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提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水平”。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佛教中国化指明了方向。与此相应,中国佛教协会相继出台《关于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意见》以及《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等文件,为寺院管理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6][7]}。

我们不妨先看一组数字:目前全国佛教寺院约有3.35万座,教职人员约22.2万人,其中汉传佛教寺院2.8万余座,藏传佛教寺院3800余座,南传佛教寺院1700余座^[10]。如此庞大的宗教活动场所体系,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世俗化的冲击、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多语系寺院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无不要求寺院管理必须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可以说,寺院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已是不言而喻。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旨在丰富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与寺院管理创新的相关研究,完善多语系寺院管理

对比研究；在实践层面，则期望为汉传、藏传、南传寺院管理创新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路径，助力佛教更好发挥其社会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寺院管理创新的研究，近年来已取得不少成果。圣凯围绕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与寺院管理创新，基于“六大建设”理念对寺院管理改革进行了系统研究^[1]；谢热、才项多杰以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共同管理、协助管理、自我管理”三种模式为例，探讨了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的创新实践^{[2][5]}；郑筱筠从佛教中国化视角出发，对中国三大语系佛教寺院管理创新的差异性与统一性进行了富有洞见的分析^[3]。然而，平心而论，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多语系对比研究尚不够深入，南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的研究相对薄弱，部分创新路径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践的检验和验证。本研究正是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尝试构建一个覆盖三大语系的寺院管理创新分析框架。

国外学者关于佛教寺院管理的研究，近年来也开始关注数字化管理和宗教组织治理等议题。不过，由于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外研究的结论未必能直接适用于中国语境。因此，本研究的切入点，便是立足中国实际，从三大语系的比较中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寺院管理创新之路。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与比较研究法。在文献方面，重点梳理核心参考文献及政策文件；在案例方面，结合浙江汉传佛教“智治”实践、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模式等典型案例^{[4][2]}；在比较方面，则对比分析汉传、藏传、南传寺院管理创新的差异性与统一性^[3]。

研究思路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首先阐明新时代佛教中国化对寺院管理的新要求，继而分析三大语系寺院管理创新的现状与困境，最后提出针对性的管理创新路径并作出结论与展望。

（四）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聚焦三大语系寺院管理创新的对比分析，结合数字化、法治化等时代元素，提出贴合新时代要求的创新路径，并试图补充南传寺院管理创新研究的某些空白^[3]。当然，受限于调研条件，部分案例数据不够全面，对管理创新路径的实践可行性验证也有所不足，这是本文的客观局限，有待后续研究加以弥补。

二、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一）核心概念界定

新时代佛教中国化，是指在保持佛教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的前提下，促进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使佛教成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7]。《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规划纲要（2019—2023）》对此有更为具体的阐述：“新时代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培育践行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理念”^[6]。我们不妨说，佛教中国化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而是一个伴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深化、不断展开的进程。

寺院管理创新，其内涵涵盖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三个维度^[1]。理念创新，指的是寺院管理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制度创新，涉及僧团管理、财务管理、民主管理等长效机制的完善；服务创新，则包括数字化赋能、慈善服务、文化服务等方面的积极探索。

三大语系寺院，即汉传佛教寺院、藏传佛教寺院和南传佛教寺院。三者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其管理模式在组织架构、治理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是我们进行

比较研究的价值所在^[3]。

（二）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宗教治理理论、人间佛教理论与文化传承理论为支撑。

宗教治理理论，为寺院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宗教事务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治化是当下宗教事务治理的实践要求和未来走向^{[8][2]}。

人间佛教理论，则为寺院管理理念创新、服务创新提供了核心指引。圣凯在《人间佛教的组织与管理》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人间佛教与寺院制度建设的关联，为我们理解当代寺院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4]。

文化传承理论，支撑寺院在管理创新中实现佛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寺院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如何在创新中守护传统，在变革中赓续文脉，是寺院管理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三、新时代佛教中国化背景下三大语系寺院管理创新的现状分析

（一）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现状

汉传佛教寺院的管理创新，近些年来可谓亮点纷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智慧寺院”建设的蓬勃开展。

以浙江佛教“智治”实践为代表，杭州灵隐寺自2016年起导入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将传统佛教丛林机制与现代管理理念有机相融，探索推进适合当今传统佛教寺院现代化管理模式^[9]。灵隐寺还通过建设寺院数据库、优化寺院事务、提升寺院管理服务水平，形成了以数字赋能为核心的综合管理机制。据释光泉法师介绍，“灵隐寺在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基础上，结合汉传佛教丛林要求，建设寺院数据库、优化寺院事务、提升寺院管理服务水平，通过数据算法分析，形成寺院以数字赋能为核心的综合管理机制”^[9]。

在制度规范方面，广州市佛教协会的创新实践也颇有可述之处。该协会制定了《佛教活动场所法治化管理一揽子清单》，系统梳理涵盖场所登记、制度建设、宗教活动、民主管理组织、财务资产等11项核心管理模块和60项具体事务的法制清单，并配套开发数字化管理小程序，形成了“线上数据留痕+线下专业指导”的协同管理体系^[11]。这种做法，既体现了法治精神，又兼顾了寺院实际，可谓因地制宜、因寺施策。

在人间佛教理念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汉传寺院将服务社会作为管理创新的重要方向。上海玉佛禅寺探索的“文化型佛寺的都市发展模式”、普陀山佛教协会按照“集体领导、民主决策、规范管理”原则对全山实行“三统一”管理，都是值得关注的实践探索。可以说，汉传佛教寺院在理念上践行人间佛教，在制度上推动禅宗清规现代转型，在服务上开展数字化赋能，正朝着更加开放、规范、高效的方向迈进。

（二）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现状

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最显著的成就，当推依法治理的制度化建设。青海省探索形成的“共同管理、协助管理、自助管理”三种模式，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完善，已成为藏传佛教寺院管理的一张“青海名片”^[2]。

在法治化建设方面，青海省稳步推进各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的修订工作。目前，已完成了玉树、海南、黄南三个自治州的条例修订，力争在本届内实现六个自治州全覆盖^[8]。这一举措，体现了“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治理理念。

在寺院内部治理层面，拉卜楞寺堪称典范。该寺以“以戒摄僧”和“以律治教”为管理核心，通过

戒律的内规范和寺院的外规范相结合,有效管理寺院僧人¹。正如尕藏加洋在其博士论文中所言:“戒律的严谨持守不仅需要自我的检视,还要时时受到他人的监督,特别是作为僧伽的一份子,更以僧团和合为己任。”^[13]拉卜楞寺优良的学风和严谨的持戒精神,是寺院外规范与僧人内规范相结合的结果,对当代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青海省还实施了寺院基础设施建设、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宗教教职人员危房改造、寺院文物本体建筑抢救性保护、寺院危殿堂维修加固、寺院公共服务建设等“六大工程”,把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延伸到全省各宗教领域。这些措施得到了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的一致拥护和广泛好评^[8]。

(三) 南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现状

南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虽然在整体上不如汉传和藏传那样引人注目,但也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制定出台了《南传佛教僧人管理办法》和《南传佛教住持任职办法》,并成立南传佛教教风委员会,引导教职人员践行“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四条标准,加强僧才培养^[6]。

2024年2月,西双版纳州举行了南传佛教中国化实践基地授牌仪式,西双版纳总佛寺、洼庄德(景洪市大金塔寺)等12个宗教活动场所被命名为“南传佛教中国化实践基地”^[6]。这些实践基地不仅发挥僧才培养平台作用,还依托智库加强南传佛教历史研究,推动解决南传佛教中国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服务社会方面,南传佛教界积极搭建“佛光之家”“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等公益平台,开展医疗救助、救灾扶贫、环境保护等社会服务。这些举措体现了南传佛教在传承中探索管理创新的努力,也展现了佛教慈悲济世的当代价值。

(四) 三大语系寺院管理创新的共性与差异性

综观三大语系寺院管理创新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趋向:它们均以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为导向,注重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聚焦文化遗产与社会服务^[3]。在管理理念上,都注重民主管理、依法管理的现代治理理念;在制度建设上,都着力完善各类规章制度,使寺院管理有章可循。

然而,差异也同样明显。汉传佛教侧重于数字化赋能与传统清规的现代转型,在“智慧寺院”建设方面走在前列^[12];藏传佛教聚焦协同治理模式优化与法治化建设,在依法规范管理方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制度体系;南传佛教则更侧重于文化遗产与僧才培育,在管理创新的系统性和深度上仍有提升空间^[3]。

这种差异,既与各语系寺院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有关,也与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但我们不必将其视为优劣之分,而应看作是多样性中的统一、差异中的互补。

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背景下寺院管理创新面临的困境

(一) 共性困境

其一,管理理念滞后。部分寺院仍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将寺院管理局限在维护宗教活动的狭小范围内,未能充分认识新时代对寺院管理的全面要求。诚如何方耀所指出的,当前寺院管理存在“旁骛太多,掣肘丛生,随意宽严,本末倒置,考核失据”等弊端^[11]。这种理念上的滞后,使得许多寺院难以适应佛教中国化的时代需求。

其二,创新人才短缺。僧团人才培养不足,兼具宗教素养与现代管理能力的“双通型”人才极为稀缺。赵朴初先生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报告中早就强调:“自身建设的关键在于培养佛教人才,提高四众素质。”^[14]然而,时至今日,人才培养体系尚不完善,人才供需矛盾依然突出^[1]。正如圣凯所言,佛教人才的培养“需要传统丛林教育与现代学院教育的有机融合”^[4],但这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困难。

其三,创新实践落地难。部分创新路径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与保障机制。理论构想固然美好,但若不能转化为可操作的管理规范,终究只是空中楼阁。实践验证不足,也导致好的创新经验难以推广^{[11][2]}。

(二) 个性困境

汉传佛教寺院面临的主要困境,一是数字化管理水平不均衡。大型寺院与普通寺院之间的数字化建设差距明显,许多中小寺院尚不具备数字化的基础条件。二是商业开发与宗教本真的平衡难度较大。如何在坚持非商业化原则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资源服务社会,仍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9][11]}。

藏传佛教寺院的困境在于,部分地区管理模式适配性不足,传统宗教制度与现代法治体系之间的融合有待深化^[15]。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藏传佛教事务条例修订过程中,部分内容与上位法不一致不协调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8]。如何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推进法治化,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课题。

南传佛教寺院的困境更为突出:管理创新力度相对不足,“有寺无僧”现象在部分地区较为严重,宗教的社会功能面临弱化风险。相比汉传和藏传,南传佛教寺院管理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都较为薄弱^[3]。这种薄弱,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制约。

五、新时代佛教中国化背景下寺院管理的创新路径

(一) 理念创新: 锚定新时代佛教中国化核心导向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寺院管理创新的首要任务,便是在理念上实现突破与更新。

首先,要深化践行人间佛教理念。太虚大师当年倡导“人生佛教”,其本意便是“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4]。今天的人间佛教,更应推动寺院管理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正如圣凯所言,“新时代佛教中国化可以理解为佛教的‘现代化’,这是佛教变与不变辩证统一的过程”^[1]。寺院管理应将服务信教群众、服务社会发展的理念贯穿于管理始终,使佛教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积极力量^[16]。

其次,要全面强化法治理念。寺院管理层和教职人员应主动学习《宗教事务条例》及相关法规规章,依法管理寺院事务。对于藏传佛教寺院而言,要依据《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及各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推动管理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8]。所谓“国法大于教规”,不是一句空话,而应成为每一位教职人员的自觉认知。

再次,要树立协同共治理念。汉传、藏传、南传寺院应加强交流合作,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互动中共享经验,促进寺院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3]。三大语系同属中国佛教,本是同根生,更应相扶持。通过定期举办三大语系寺院管理交流会、组织跨语系参访学习等方式,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二) 制度创新: 完善寺院管理的长效机制

汉传佛教寺院应着力推动禅宗清规的现代转型。在继承传统清规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根据现代寺院管理的实际需要,完善僧团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广州市佛教协会编制的涵盖60项具体事务的法治清单,便是制度创新的有益探索^[11]。灵隐寺“厘清职责,修定制度”“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健全组织管理”“完善财务管理”等一系列做法,也为其他寺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9]。

藏传佛教寺院应持续优化青海“三种管理模式”,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在保持传统寺院制度的合理因素的同时,推动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制度化、规范化运行^[2]。各自治州应继续推进藏传佛教事务条例的修订工作,实现依法治理的全覆盖^[8]。在具体操作层面,可以借鉴拉卜楞寺“戒与规的统一”经验,将戒律的内在约束与寺规的外在规范有机结合^[13]。

南传佛教寺院应立足自身文化特色,完善僧人管理和文化传承相关制度。在《南传佛教僧人管理办

法》等已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风建设,规范宗教活动管理,探索健康传承的可持续模式^[6]。实践基地建设为制度创新的检验提供了平台,应充分发挥其“试验田”作用。

(三) 服务创新: 提升寺院的社会服务能力

数字化赋能是提升寺院服务能力的重要方向。在灵隐寺等大型寺院的示范带动下,中小寺院可以因地制宜推进数字化建设,从信众管理、法物流通、线上学修等基础环节入手,逐步构建与现代生活节奏相适应的服务模式^[9]。灵隐寺“修行要传统化,管理要现代化”的理念,值得深思和借鉴。

慈善服务的深化是发挥佛教社会功能的重要途径。寺院应依托已有慈善组织和平台,进一步拓展社会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在乡村振兴、公益助学、生态保护、应急救助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赵朴初先生当年倡导“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今天则可以转化为“服务社会、利益众生”的当代实践^[4]。

文化服务创新同样不可或缺。寺院应挖掘佛教文化的深厚内涵,推动佛教文化与非遗保护、文旅融合协同发展,使寺院成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11]。在这方面,杭州灵隐寺的“文化引领、文化兴教”理念、重庆华岩寺的佛教博物馆建设等,都值得借鉴。

(四) 保障措施: 为管理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人才保障是寺院管理创新的基础。应加快构建系统化的僧团培养体系,重点培养兼具宗教素养与现代管理能力的“双通型”人才。正如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所指出的,“人才建设是佛教自身建设的关键,是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推动佛教事业健康发展的千秋大计”^[10]。西双版纳南传佛教实践基地的建立,正是聚焦“双通型”人才培养的具体举措^[6]。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应探索传统丛林教育与现代学院教育优势互补的培养途径,实现“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14]。

政策保障是管理创新的制度支撑。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继续完善相关法规规章,各级佛教协会应加强对寺院管理创新的引导与支持,确保管理创新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8][10]}。《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的施行,为寺院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应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实践保障是管理创新落地的关键环节。应加强对寺院管理创新实践的跟踪调研与案例研究,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优化创新路径^{[2][11]}。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只有经过实践验证的创新路径,才是真正可行的路径。

六、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新时代佛教中国化背景下,中国三大语系佛教寺院的治理创新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实践图谱:汉传佛教聚焦数字化转型与传统清规的现代重塑,在“智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藏传佛教着力推进法治化建设,以“三种管理模式”为支撑构建依法治理体系;南传佛教立足自身文化传统,以制度完善和僧才培育为突破口探索健康传承路径。三者虽因历史文化传统与地域特点而存在差异,但在理念创新、制度完善、服务社会等维度上表现出共同的趋向^{[3][2][6]}。

然而,寺院管理创新仍面临理念滞后、人才短缺、创新实践落地难等共性困境,以及数字化发展不均衡、制度适配性不足、管理创新力度薄弱等个性困境^{[11][12]}。破解这些困境,需要在理念上坚持以人间佛教和法治精神为引领,在制度上构建分类施策、梯次推进的长效机制,在服务上以数字化和慈善化为抓手拓展寺院社会功能,同时夯实人才建设、政策供给和实践验证三大保障^{[4][9][10]}。

寺院管理创新,说到底,是佛教在新时代实现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它关系到佛教能否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关系到佛教的优良传统能否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唯有多方协同、分类施策,方能实现中国佛教治理体系的全面提升。

（二）研究展望

本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还有许多未尽之处。后续研究可扩大调研范围，选取更多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寺院案例，对本文提出的创新路径进行实践验证与修正完善。可进一步深入研究数字化、智能化对寺院管理创新的影响，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在寺院管理各环节的深度融合^[9]。同时，应加强三大语系寺院管理创新的深度对比，在共性中提炼规律，在差异中寻求互补，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的寺院管理创新理论体系^[3]。

最后，借用赵朴初先生的一句话来收束全文：“当今中国的佛教适逢大好机遇。”^[14]只要我们把握机遇、勇于创新，中国佛教一定能够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圣凯. 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与寺院管理创新——基于“六大建设”的实践路径[J]. 世界宗教研究, 2022(01): 12-20.
- [2] 谢热, 才项多杰. 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实践——以青海“三种管理模式”为例[J]. 青海社会科学, 2023(02): 156-163.
- [3] 郑筱筠. 中国三大语系佛教寺院管理创新的差异性与统一性——基于佛教中国化视角[J]. 中国宗教, 2025(01): 68-70.
- [4] 圣凯. 人间佛教的组织与管理[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20.
- [5] 陈玮, 谢热等. 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研究——青海实践与经验[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23.
- [6] 中国佛教协会. 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Z]. 2019.
- [7] 中国佛教协会. 关于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意见[Z]. 2023.
- [8] 兰措卓玛. 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青海实践及启示[J]. 青海社会道慈科学, 2021(05): 148-153.
- [9] 释光泉. 在戒律清规的框架下, 探索适合当今寺院现代化管理的模式[J]. 法音, 2023(06): 15-18.
- [10] 释演觉. 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 推动佛教事业健康发展——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工作报告[J]. 法音, 2020(30): 4-12.
- [11] 何方耀. 都市佛教寺庙社会功能和社会角色定位浅析——以广东佛教界的实践活动为中心[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02): 57-64.
- [12] 释道慈. 推进教风建设根本任务 肩负弘法利生责任担当[J]. 法音, 2020(22): 4-6.
- [13] 尕藏加洋. 拉卜楞寺律仪制度研究[D]. 成都: 西南民族大学, 2022.
- [14] 赵朴初. 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J]. 法音, 1993(06): 2-9.
- [15] 国家宗教事务局. 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Z]. 2024.
- [16] 国家宗教事务局.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Z]. 2023.